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	陈修和(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	陈修和(13)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	李国伟(27)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	资耀华(40)
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 的回忆	戴立庵(49)
书暴江狱	章士钊(57)
蒋介石建立空军的内幕	许念晖(59)
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	黄绍竑(63)
桂系及其反动的政治组织	黄启汉(105)
阎锡山的铁军内幕	朱崇廉(114)
流氓军阀孙殿英	张述孔(121)
刘神仙与四川军阀	蒋尚朴(141)

补充和订正

关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等同志的被害	宋云彬(149)
《南行使命》文内有关汤芑铭史实订正	陶菊隐(150)
关于袁世凯	恽宝惠(150)

附注

对《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十八辑、第三十一辑

对《关于袁世凯》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

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

陈 修 和

一、中越交通的调查和铁路公路的扩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时，我正在陕西宝鸡勘查计划中的兵工厂厂址（我当时是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忽得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急电，要我赶回南京。我回到南京后，俞告诉我说：“中日战事已起，新建兵工厂缓不救急，我国部分军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从外国进口，而沪、粤等处海口将为敌人封锁，无法输入，惟越南海防有铁道通入云南和广西边境，可以补救这个严重问题。已同法国驻华武官商谈过，我国军火有权通过越南，希望你偕同法国军火商龙东前往越南视察中越交通情形，期于一个月内返京。”我接受了这项任务，立即找到法国武官和龙东，商办赴越手续，当日签妥护照，偕同龙东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乘西南民航机飞往河内。我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已先得电报，我飞抵河内后，即同总领事许念曾、龙东到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与主管部的政治部长面谈。他同意我国军火物资在越南通过，惟德国制造的武器，则拒绝假道。我先后在河内、海防住了几天，调查海防港口和越北铁路、公路的设备情况及运输能力后，乘火车到达越南边境的同登，经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到龙州，又由龙州乘车到南宁，与两地广西地方负责当局商谈运输问题和改善水陆交通办法。随后，我由南宁乘飞机到桂林，看见了李宗仁，他也表示尽力协助改善广西的交通，支持抗战。我

于八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发动侵犯上海的战争，新辟一条国际运输线已十分迫切。

根据这次短期的调查，海防港口，万吨轮船可以停靠码头，起重和仓库设备也相当完善，惟越南铁路均系窄轨，海防到昆明的滇越线计长八百四十八公里，山洞甚多，坡度极大，每月运量只有一万吨左右。由海防到广西边境的铁路二百六十七公里，路线较平，没有山洞，每月运量较大，但终点那岭在龙州左江上游支流的越南边境，仅有小船可以接运，大件器材不能通过。一般运输都从同登车站（距镇南关四公里）转入南镇公路，先到南宁，虽小费巨，很难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因此，我根据上述情况草拟了一个报告书，建议由同登建筑一条约五十公里的铁路支线通到龙州，再将龙州以下的各河流加以整理，使小轮和木船能终年通航，大件器材可以经越桂铁路运入，通过水运转到内地；同时改善现有公路，加强水陆交通联系，扩大运输能力。俞大维将我的报告转与何应钦和蒋介石，他们都批准了，并限令交通部于六个月内将龙州到同登的铁路修成，同时赶工整理广西的公路和航路。

但是，南京交通部派员测勘后，发现同登至龙州间山谷较多，工程较难，遂决定改筑同登经镇南关至南宁二百公里的南镇铁路。当时交通部长张嘉璈不考虑军事上的时间性，不按照中国自己抢修铁路的积极办法，却勾结法国殖民资本家的法国银行团和官僚资本集团宋子安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合组中法建筑公司，承包兴建。谈判数月，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将公司成立，在谅山设立工程处。在这样迁延时日、组织复杂的情况下，尽管这条铁路地势平坦，只有一条小隧道，没有大桥，工程进行，仍极迟缓，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才筑成通到左江岸边崇善约一百公里的窄轨路基，但铺轨尚未完成，而日军已从钦州登陆，侵入南宁，因而又不得不仓皇拆除。此路从批准到兴建，前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而军事运输始终未能利用一次。

抗战初期，中越交通除了上述的南镇铁路外，还在距这条路

线西北二百公里以外地区修了一条公路，称为田岳路和河田路。该线起自黔桂公路的车河，经东兰、田州、田东、天保、靖西到越边的岳墟，与越南高平属重庆府边区公路连接，共长约五百公里。越南境内，从海防、河内、高平到岳墟的公路约四百多公里。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侵占海南岛，以后又封锁我沿海区域，禁止外国商轮航行，南镇路受到海上敌人可能登陆的威胁，遂赶工修筑这条公路。人民群众在抗战热情的鼓舞下，很快就建成了路基。是年十一月南宁失陷，该路未被切断，在敌军侵入越南以前一段时期内，尽管受到法殖民当局的许多限制，仍然继续担负了重要的军运任务。

二、中越运输概况和法殖民政府扣留 苏联援华军火及抗战物资

日寇侵犯上海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当局尤其是兵工署方面，要求立即在西南地区建立国际运输机构，乃由军事委员会命令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在广州组织西南运输处，担任进口军用物资的运输。我于九月初旬再赴广州，代表兵工署与西运处联络并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九月下旬，有法国制造的武器一批经过越南运入广西，我前往担任检验和接收工作。时西运处已在南宁和河内设立分处，俞大维也要我在河内设立办事处，但我因为河内业务不多，请领馆和西运处协助，已足应付，没有成立。

抗日战争开始后，苏联为了支援我国抗战，经与杨杰（中国政府驻苏大使）商妥，将苏军自用的军火仓库拨了一座，在黑海某军港装船，秘密开赴远东。其中两艘轮船指定在海防转口，运入我国。所装的战车、火炮等大件，均准备随时交付部队使用，未曾装箱，以致在海防码头装卸时，被日军间谍看见，日本政府据以向法国殖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运入我境。法人畏敌如虎，接受了日人的无理要求，停止我方运输。当时仅有战车、战防炮及小部分

弹药已装入火车(约二千吨左右),原拟运至同登卸下,经公路运入广西。我们得到法人禁止内运消息后,急从同登将原车折回,改经滇越铁路运昆明,等到法殖民当局命令到达,这列火车已离开越境了。这批武器突然运到昆明,接收保管,均无人负责,除电告重庆外,我飞往昆明先同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航空学校校长陈庆云商洽,暂由当地驻军和航校代为看管。没有几天,兵工署已派员到昆明办理接收,我就飞回河内。这次紧急措施,仅仅运出整批中的大件部分,尚有大批弹药卸置港口,法人不准通过,又不准转船他运,实行扣留。我国政府向法国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几次交涉,均无结果。根据中法条约,我国军火有权由滇越路通过,法殖民当局扣留这批械弹,实属违反国际条约,经我方严重抗议之后,才同我们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让我们采取走私方式,由海防装小舟运至芒街,转入我国广东边境的东兴。时宋子良已代曾养甫接管西南运输处,他同意了我们的协议,据情转告蒋介石。我国军事当局迫不得已,批准了这个办法。但此时敌人军舰早已停泊钦州湾外,我们的行动如稍不机密,即有遭炮击的危险。为了安全和避免损失,我先赴南宁与西南运输分处处长汪英宾乘车经钦县、防城到东兴,考察该线公路情形,布置中越交界的接转地点。凡临近东兴沿线竹木丛箐的荫蔽地区,均划作暂时存储的露天仓库,以备转运。我由东兴进入越境芒街,乘小轮返海防,视察沿海情形并与海防西运分处处长黄强详商偷运办法。布置已毕,我即同黄强和西运处工作人员驻于芒街,汪英宾则驻于对岸我国境内的东兴。我每日通过中越国界的大桥,往来两方,密取联系。海防卸存械弹装上木船,用小轮拖带,沿着海边,转入芒街内河,再驳上东兴江岸,运到预先指定的临时仓库。如此昼夜工作,历时几及一月,始将三千余吨的械弹运入国内。是时戒备极严,凡行踪可疑的外来行人,均暂予扣留,俟运输完毕,再行解禁。日寇于开始驳运的前一日,忽派飞机在距东兴二十余公里的白龙尾海角投弹数枚,幸均落空地,未受

损害。当时敌人或已微有所闻，但终未发现我们偷运的形迹，虽东兴口外，敌舰在望，我们兢兢业业，时虞炮弹飞来，但二十余日中，幸未发生意外事故，参加工作的同人，莫不感到十分庆幸。从此以后，除法国制造的武器外，各国军火都不得假道越南，而法人供给我们的武器为数极微，因此，滇缅公路遂成为此后从海上输入军火的唯一要道了。

我国军火虽不能从越南经过，但机器材料尚未发生过境问题。当时军政部已决定在昆明附近建立四个兵工厂，由东南内迁的兵工厂，也匆忙间在黔桂两省的桂林、柳州、贵阳等处重建，因而从越南运进机器材料，仍然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南镇铁路的修筑，正与法人开始谈判，尚未动工，仅靠公路运输，汽车少，路线长，运量有限；同时滇越铁路也因昆明对内地交通尚未改善，铁路的能力没有充分利用。据法人印度支那统计年鉴称，由海防到昆明的铁路运量，一九三七年为三万三千多吨，一九三八年仅增到五万一千多吨。这个数字虽然仍有遗漏，但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一般情况。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越南海防就成为我国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依靠的港口。原来经过香港内运的公私物资，均大量地涌入海防，码头仓库，货物充塞，沿江马路，机器材料堆积如山。驳船停滞江心，不得卸货，甚至有载重过量以致沉没的。海防港务局因存货过多，仓库不能容纳，又无法疏散，遂限制货轮入口。我国公私机关竞事抢运，滇越铁路成为活动的中心，投机商贾和公私不分的国民党官吏，贿赂管理铁路的法人，购买运货车皮，大发其国难财。该路每月运量不过万余吨，海防存货已在十万吨以上，旧的未运出，新的又到，拥挤情形，有增无已；而法国殖民政府官吏凭借权力，多方留难，要挟需索，无所不至。

抗战以前，中国政府在越南的机关只有外交部的河内总领事馆、海防领事馆（属河内总领事馆领导）和西贡领事馆（直属外交部）。抗战以后，重庆政府各单位在越设立的机构计有：西南运输

处海防和河内分处、军政部兵工署驻海防办事处、交通部驻河内和海防代表办公处、航空委员会驻海防办事处、资源委员会驻海防办事处。中央信托局、航空公司、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都在河内、海防设有营业机构。其他机关、工厂、学校和私人企业等派有代表经常往来或住在海防、河内的数目也很多。同时，海防、河内也到了大批中国的投机商人，旅馆住宅，满坑满谷，酒食征逐，歌舞喧闹，沪、津、港、粤商埠的恶习，充分暴露出来，使越北变成了空前繁华纷扰的情况。华侨和越南人民习于节约，对这种不顾国家危难的败类，表示十分愤慨。行政院根据报告，曾三令五申，予以告诫，但是，这些发国难财的人大都是孔宋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有关的人物，他们习见于孔宋家族的骄奢淫逸生活，对于孔祥熙（当时的行政院长）的命令，莫不嗤之以鼻，毫无忌憚。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对德宣战，十一月日寇侵入南宁，南镇公路全线失陷，幸新修的田岳和河田公路，已接通越南的高平，但未铺路面，勉强通行。当时停滞海防、急待入口的公私汽车，达五千辆以上，由谅山至高平的公路，路面狭窄，只准单线往来，法殖民当局规定每日通过车数为五十辆，限制了我国的抢运。敌人侵据龙州后，已无力前进切断公路，乃派机轰炸，阻扰行事，我运输车队虽时有损伤，仍昼伏夜行，未曾间断。

是时滇越铁路的运输，异常拥挤，公私机关，不择手段，抢运物资。敌人又派机轰炸云南境内开远和河口附近的铁桥，桥梁被毁，铁路中断。兵工署留存海防的机器材料尚存一万多吨，昆明、重庆各厂均待这批器材开工。俞大维鉴于情形急迫，遂报请蒋介石统筹运输办法，以图补救。蒋命宋子良亲赴河内主持西运处工作，海防分处改由陈体诚负责。我也代表兵工署专设机构与西运处配合，同时商请铁路当局予以协作，凡公私物资经过滇越铁路，均由西运处统一支配，所有铁路平车，全装兵工机器，径运昆明，而汽油、五金材料，亦列入优先起运。时铁桥尚未修复，我同宋子良乘汽油车赴开远视察抢修情况，并决定在铁桥尚未修复之前，

先将重要器材运入国境河口储存,再待接转。过了二十几天,便桥完成,才恢复通车。

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借故留难,乘机掠夺。他们看见我国军用物资堆积海防,十分羡慕,尤其对于兵工机器,觊觎最久。当欧洲战事发生以后,如前所述,法殖民政府即宣布德国制造的商品不准通过,并将我国兵工署大批德制机料予以扣留。事实上,这些机料早于欧战发生前运存海防,待车转口。法殖民当局不顾这些事实,仍然视同敌货,企图没收。中国政府与巴黎法政府交涉再三,才同意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我国货单上签字,证明已属我国物资,飭令放行。但法国殖民军部借口军事需要,突于某日又派军官到海防仓库,不许德制机器起运,一再交涉,毫无结果。我考虑当时的情势,再难等待重庆命令或拖延时日的谈判,遂与法军部直接商量,凡同类的工作母机,其数量较多者酌借一部分,其余的机器,即任我起运,他们同意。我从权借了新式铣床十几部和其他零星机械,由法总督府与我国驻河内总领事馆办理正式借用手续。这些殖民强盗,暂时达到目的,短期中没有再来留难,被扣的一千余部重要机器加速地运到昆明,各新办的兵工厂才勉强开工生产。我事后报告兵工署,重庆方面也只好追认。

滇越铁路是坡度很大的窄轨(一公尺轨距),货车载重量(二十吨)和山洞限界都很小,不能通过大型机器。兵工署原来购好的几部水压机无法运入昆明,又不能从广西运到内地,曾计划将这些机器运过国境的河口附近(海防到河口一段无山洞),在红河边设一分厂,但为了军事上的安全,没有决定实行,这些机器以后一直弃置在海外。

国民党政权从来不计划自己设厂制造兵工材料,完全依靠外国供给。抗战两年,存货和进口的物资,几乎全部用罄。重庆各兵工厂急待进口材料开工,电请由河内空运接济。我们虽然尽力交运,因为数量太少,无济于事。当时公路运输,均系分段接转,费时很久,错误甚多,不能按需要运到。我同西运处商定,将急用

兵工材料装卡车百辆，由海防经广西新公路直驶重庆，试办一次，以应急需。兵工署对于如此长途行车，颇表怀疑，但历时不到一月，由于司机同志的勇敢机智，冒着敌机轰炸，仍安全到达，毫无损失。此后各兵工厂遂纷纷要求由海防直运机料，惟施行不到三个月，中越交通又被法殖民政府封锁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欧洲法军失败，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日寇要求法殖民政府停止中越运输，派日人监视封锁中越边境。法殖民当局不顾中法外交，接受了日寇的要求。我国运存越南的公私物资，尚有十余万吨停留在海防各地，唯一的希望，只有转往缅甸，从仰光进口，但英国殖民当局，也接受了日寇的要求，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国民党政权妄冀英法帝国主义者不致投井下石，遵守国际条约，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之后，仍然没有使他们有丝毫的觉悟。我国存越的重要物资，虽曾计划转口一部分，但进行不久，因日寇进军而停顿下来，中越运输从此完全断绝。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国经过越南的物资，除苏联援华军火外，以生产资料的机器、材料占主要部分。数量最大的是飞机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生活资料则比较居于次要地位。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运量较大，根据回忆，粗略估计滇、桂两省的铁路公路，每月运量始终没有超过两万吨，而时遭阻扰，断断续续。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可能达到三十多万吨，连同开始的一年多，即抗战前期的两年九个月当中，我国经过越南运入的公私物资，约在四十万吨左右。被法人扣留一直没有清算清楚成为悬案的，当时估计约有十几万吨，其中包含的物资仍以机器材料所占的比重为最大。

当运输紧张之际，我国运输机关里的中越职工（曾由广东调来一批中国工人分担装卸）都昼夜工作，抢运机料，同心协力，完成任务。越南人民和华侨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支援我国抗战，在这个回忆当中是应该提到而深深感谢的。

三、法殖民政府拒绝同我国合作抗日 和日寇进入越南后的情况

自从法殖民政府封锁中越边境，停止中越运输后，日寇又进一步要求法殖民当局签订日法军事协定，想从中国拔出泥足，进兵越南，作为南进的根据地。法国殖民者模棱两可，观望形势。我们各机关推驻越总领事许念曾面见印度支那总督德古，探询他对于日军的态度。德古提出：“假使法人抵抗日军的侵犯，中国方面究将给予怎样的支援？”领馆据情电告重庆政府，立得回电：“如法军与我合作抗日，我政府决定派九师兵力援助。”但法国殖民当局得到我国的通知后，仍迁延观望，不作决定。嗣后我驻越各机关鉴于情势紧急，推我飞重庆面见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越南情形。经何转告蒋介石，要我于次日返越，邀请法方派军事代表到重庆面商。我赶回河内，即由许念曾面告德古，并留专机等候他的代表飞往重庆。经过半天的商谈，法殖民当局真情暴露，原来他们已准备接受日人的要求，拒绝同我国讨论合作了。

日军由桂边侵越，法殖民军中的越南官兵，乘机革命，纷纷起义，于是日军很容易地包围了谅山。海防日舰也采取行动，日空军更用法国造的飞机，向海防河内投弹。法国殖民者养尊处优，素无斗志，军事设施，只作镇压越南人民的工具，实无抵抗日寇的能力。并且外震日军的勇猛，内惧越人的革命，尤怕我军入越，华侨合作，法人地位根本动摇，所谓备战求援，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欺骗国际视听，掩视其怯弱而已。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日协定签字，日军由谅山、海防两处向河内前进。法殖民当局通知我领馆：“已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我国驻越各机关骤得这个消息，即商滇越铁路局，特备车辆，将我国全部驻越公务人员撤至老街转入国境。时河口铁桥已为我军炸毁，滇越铁路从此中断（一直到解放以后，才由新中国和

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其修复)。驻河内总领事馆原拟随车入滇,因中法外交关系,尚未完全断绝,我国三十万以上的侨民,散处越南各地,领事馆负有保护责任,应否撤退,我们研究由许总领事与越督面谈后再定。许当夜会见德古,德古要求河内中国领馆撤到顺化或西贡暂住。我考虑存越的军用物资,已有一部分疏散越南各地,可能乘机转口,抢运仰光。因此,我同领事馆人员于二十二日午夜乘汽车南下,而入越日军即于次日进河内,开始搜索我驻越公务人员和预备待命的员工,其中有被敌军逮捕残害的。

我们赶到西贡接获河内消息:我国原拟转口物资,因敌军初到,尚未完全查出,仍可运离越境。在敌军进迫时,我们曾疏散重要材料一千余吨暂存越北义安的边水港,内有钒铁、铬铁、钼铁、钼铌等军用冶金原料,大战期间,势难再向国外购入,乃急电香港西运处请派专轮驶赴边水接运,立得复电租轮前往。我赶到边水,协同抢运。船方出港,当地海关突奉法殖民当局电令扣留,然已不及矣。海防装运转口物资各轮,乘日军登陆秩序紊乱之际,开出了几艘,但不久即为敌人察觉,有一艘被扣,强令将船内器材卸回,其余的就不能再动了。此后我存越物资,遂全入法入掌握,任敌军予取予求。重庆政府对法殖民当局的违约行为,虽曾屡提抗议,而越南的法殖民当局一向以我国为最大的假想敌人和进一步侵略的目标,乘机打击,毫无顾忌,甚至巴黎法国政府与我国外部商定的办法,他们每每不肯遵行,法政府派员督察也难以生效。帝国主义者放纵其殖民地官吏违法横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我们的抗议恰恰是这些殖民强盗讨好日寇的最好资料。

日寇侵入越南,占据海防、河内及附近重要交通地区,法殖民主义者,俯首听命,与维琪贝当政权,狼狈相依,助纣为虐。敌人封锁我国运输线的目的已经达到,侵占南宁等处的敌军,受到我人民游击队和恶劣气候的袭击,伤病累累,遂全部退入河内,集中整理,补充休息,而将中越边界交法军驻防,代为守御,脱离了与我军接触的困境。从此,法军受了日寇的指挥,成为日寇的仆从;

日军不损一兵一卒，控制了北越的军事要地。

当日寇开始向越北进攻的时候，利用越南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情绪，装着同情的模样，鼓吹黄种人团结驱法，因此，曾有一部分人受其欺骗，为日寇利用。而法国殖民强盗虽然不敢抵抗日军的侵入，但对于风起云涌抗法起义的越南人民，如西贡近郊等处暴动，则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用猛烈的炮火，毁灭整个村庄，杀尽无辜人民，情况惨烈，闻者痛心。当时我正由西贡赴河内，在一个旅馆里午餐，一位越南服务员，很殷勤地招待我们，他后来问明我是中国人，诚恳地说：“我们是同族兄弟啊！我在不久的下一个月就要到河内日本军营里从军去了。”我很惊异地问他为什么，他奋激地说：“我们受了法国殖民者长期的压迫与残杀，不能再忍耐了，我们要联合日本人把法国人赶出去。我们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中国同日本为什么不能合作？”我很同情他反法的热情，但是，因为他们对于日本军阀的残酷的侵略行为还不了解，我举了朝鲜和中国历史上的事例，以及最近日寇在中国的罪行，劝他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越南人民不久就有解放的机会，最后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事实证明，法国殖民主义者血腥地镇压越南革命，是日本军阀支援的。日本法西斯的凶恶面貌，不久即在越南人民面前逐渐地被揭露了。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泰国乘日军侵入越南，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政府索还失地，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后经日人调停，法殖民当局割让柬埔寨及老挝一部分土地，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西贡日舰上签字，法泰纠纷，暂时告一段落。日本军阀乃加紧压迫越南人民，帮助其法国傀儡安定越局，以便掠夺物资，奴役人民。在以后的四五年中，越人受日法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与剥削，过着非人类的生活，并发生了饿死二百万人的惨剧。

法国派驻重庆的外交代表，鉴于我国大批物资扣在越南，法国政府万难推卸责任，乃与法殖民当局筹划，拟将我国物资转让，或运出一部分。我奉命暂留越境，待机洽商，并往来于西贡、河

内、高平等处，调查可能抢运的办法。我虽时与日人相遇，幸未遭其毒手，盖日寇仅据守战略要点，对于越南民政表面上不加干涉。汪伪政权已派员入越，设立机构，拉拢华侨，只要不是重庆政府派的人员，尚可自由通行。我改易姓名，另换护照，往来各地，均于小站下车，再换车到达目的地，故始终未被敌人发觉。

日军既侵据越北，更要求占领全越的军事基地。法国维琪政府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签约承认，日海军亦将陆续在沿海登陆。我的任务虽未完全終了，但留此已无作用，乃电兵工署报告越中交通运输线绝望形势。时我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原任处长方兆镐调赴仰光，俞大维急电我赴香港接替，遂于七月二十八日由西贡乘轮赴港，结束了我自抗战开始到越南建立中越交通线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入越受降纪略

陈 修 和

一、法殖民军的逃入云南和阴谋返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军总部)于昆明,何应钦从军政部长的职位调来担任这个机构的首脑,越南方面的军事任务也划归陆军总部直接管辖。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驻越南的日本军队突然以武力解除法殖民军的武装,并将所有法籍军民全部拘禁在集中营内。驻在中越边境的部分法军,纠集越籍士兵三千余人,由原任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军参谋长亚力山得里中将军率领逃到我国云南境内。陆军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报告了重庆,法军驻重庆的代表极力要求我国收容,准其留驻在云南境内,给以盟军的待遇。重庆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命令陆军总部就地安顿。但驻防滇南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对于这一批不久以前还是我们敌人的法军不肯收容。何应钦为了处理这个问题,除电卢汉遵照重庆的指示外,命我亲往开远同他商量,并赴建水、石屏等处视察法殖民军的情况。我去视察时,看见这些曾经作威作福、双手染满越南人民鲜血的法国强盗,协同一些越籍士兵十分狼狈地散住在破庙或公共建筑中,他们衣服褴褛,口粮困难,向我们摇尾乞怜。我同卢汉商量的结果,决定将他们安顿在蒙自附近草坝的营房里,一切给养由陆军总部按盟军待遇予以供应。

一九四五年七月,国民党军在湘西反攻告捷,陆军总部前进

到湘西的芷江,另于昆明设立办事处。何应钦派我担任办事处主任,负责处理后方留守工作和与美法军接洽的事宜。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我们得到消息后,因为出乎意料之外,对于胜利后的安排,毫无准备,因此反而有些无所措手。盟军总部规定法属印度支那十六度以南由英军受降,十六度以北由我军受降。驻昆法军司令亚力山得里向我洽商,派法国飞机到河内与日本联系。我报告了何应钦,认为他的阴谋是想法机一到河内,就可打出电报,在国际上宣传法军已重回越南,收复河内。我们都主张决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立即命令昆明空军司令晏玉琮将停在机场的法国飞机予以扣留,以防其潜飞越南,并严令驻在云南境内的法军在我军接受日军投降之前,应驻原地待命,不得进入越境。法机被扣后,驾驶法机的空军军官向我探询被扣原因,我把这些经过告诉他们。他们认为亚力山得里无权指挥法国空军,他这种不适当的活动使别人无辜受累,并要求允许他们飞回法国,保证不飞往越南。我答复他们说:“法国飞机要等待中国军队到达河内以后才能放行,你们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可以上飞机查看,但不准起飞。”亚力山得里也极力向我解释,说他并没有别的意图,完全是出于一种误会,要求把飞机放行。我推说是何总司令的决定,非待中国军队进到河内不能改变这个命令。亚力山得里屡次要求面见何应钦,企图打破我这道难关。我主张接见亚力山得里,当面揭穿他这次的阴谋,杜绝以后的破坏活动,并严厉指出他过去在越南阻挠我们的军运、扣留我们的物资、勾结日军、反对同我们合作等等罪行,声明我们不咎既往,已很宽大,决不允许他捣鬼和干预受降工作。亚力山得里随带一名中国译员(是一个姓王的老留法学生)来见,何应钦同我一起接见他。何听了他的报告和要求后,就将我们预先商定的话用申斥的口吻说了一遍,而他的译员竟不敢照直翻译,只是轻描淡写地译了几句。我听了很生气,立即质问译员为何不照实翻译,何应钦也勃然大怒,要我翻给他们听。我觉得如由我口里说出来,可能使亚力山得里误以